

论词学批评中的“以诗比词”

彭玉平 向 娜

内容提要 “以诗比词”指的是词学批评中将诗词的作者、作品、发展阶段等进行比拟或比较,借助诗歌风格、成就等方面的特征,以表达论者对词的评价与判断的批评方式。这种现象开始出现于宋代对词人词作的点评中,至清代以后则成为词学批评的常见方式,其内容也几乎涉及词学的所有方面,并表现出系统性和理论性。“以诗比词”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诗词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其价值则在于反映了词体文学及词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以诗为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而诗词并论的方式将词纳入了主流文学的体系中,也有助于词的尊体进程。

关键词 词学批评 以诗比词 词体

“以诗比词”之“比”,兼取“比拟”与“比较”两种意思,这两种方式的差异在于,比拟是立足于视诗词为两种独立的文体系统的基础之上,比较则通常是在诗词同源或同质的立场下,将其中的对象进行比较。两种方式共同之处在于,都是通过寻找诗词中对象的相似点,借诗的特点以表达对词的看法。对于“以诗比词”的现象,学界此前已经有所注意,不过关注的重点基本限于具体诗词作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尤其集中于对“词中老杜”的讨论,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梳理词学史上曾被比拟为词中杜甫的词家,分析各种比拟的出发点及其是否成立。^①也有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梳理的,但其关注点仍在于具体词论中提出的对应关系。^②但作者的比拟只是“以诗比词”的一个方面,其涉及的内容远不止此,且“以诗比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方式,其本身也因体现了词学观念的发展以及诗词之间特殊的关系而值得关注。因此,本文将“以诗比词”这一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具体词论中“以诗比词”的对象或者其中的比拟、比较是否成立,而在于这

种现象本身的发展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词学观念和理论价值。

“以诗比词”批评方式的源流、类型与发展

较早具有“以诗比词”性质且影响较大的词论出自苏轼:“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③以唐诗的高度评词,不仅是对柳永个人创作的肯定,也包含着对词的认识的转变,即不再将词视为小道末技,而是认为其在境界上可以达到诗之高度。黄庭坚《跋秦少游〈踏莎行〉》云:“右少游发郴州回横州,多顾有所属而作,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诗也。”^④刘禹锡楚、蜀间诗,是在遭遇政治上的挫折之后,有特殊寓意之作,其中有政治上的讽喻,也有个人身世的感慨。黄庭坚这里将少游词与之相提并论,也正是借此指出少游此词“语意”曲折,当有特殊寓意。与苏、黄就具体作品“以诗比词”不同,黄裳《书〈乐章集〉后》云:“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

有。”^⑤则着眼于整体的创作,从作品对现实的反映及“典雅文华”的特征上,将柳词比为杜诗。而“如观杜甫诗”,也已经是典型的“以诗比词”句式了。到了南宋,“以诗比词”的对象进一步扩大,陆游《跋后山居士长短句》云:“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⑥立足于整体的创作风貌与成就,将唐末词比于汉魏乐府,将“以诗比词”的对象扩展到时代。张炎则进而扩大到文体,其《词源》云:“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数十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⑦将诗词的体式进行对比。小令与绝句分别为诗词中最为短小的形式,欲以有限的字句表达足够的情感与内涵,则必然从凝练含蓄处下功夫,因此皆追求以有限的字句表达丰富的意蕴,确实颇为相似。

由以上之分析可知,“以诗比词”的现象在宋代已经零散出现,虽然尚不成系统,所论也以具体比拟为主,但已经涉及了词学的不少内容,并昭示着词在功能、内容及其与诗歌的关系等方面在发生着变化。

词的地位在元明时期有所下降,因此以诗比词的现象也比较少见。不过,明代出现的少数几则却非常具有典型意义。首先是蒋芝《诗馀图谱序》论秦观词云:“而秦之赋才特长于词,故谓其以词为诗。盖秦之于词,犹骚之屈、诗之杜,千载绝唱也。”^⑧以诗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来标榜所论对象之成就地位,是后来清代词家常用的手法,“词中杜甫”说便是其中典型。蒋芝这段话所引用的虽然不限于诗,却是最早的类似表达。俞彦《爱园词话》云:“唐诗三变愈下,宋词殊不然。欧、苏、秦、黄,足当高、岑、王、李。南渡以后,矫矫陡健,即不得称中宋、晚宋也。”^⑨借与唐诗演变阶段的比较,分析宋词发展演变的特征及各时期的成就,已经具有了史的眼光。这也是最早将唐诗宋词的发展阶段进行系统对比的例子。套用唐诗的分期,在清代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俞彦堪称导其先路。

清代以后,“以诗比词”的批评方式更为常见。如果说宋人“以诗比词”还有些不够自觉的话,清代以后的词家则更多是有意识地在寻求诗

词的相似之处,并在明确的目的下以诗比词。因此不仅涉及的内容更广,也往往呈现出相当的理论性与系统性。其具体内容可按照所论之对象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词人

作者一直是“以诗比词”最常见的对象,而清代以后的此类词论,更明确地体现出借诗人的突出特征作参照,以衡量、评价词人的目的。其具体的角度与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成就地位。以诗人比词人,无论从何种角度,皆体现出对其成就高下的判断,故此处专指以词人的总体成就与诗人相比拟,从而对其进行词史定位的词论。这其中又有单独和系统的比拟之别,单个词人与诗人的比拟,最为突出的是借与重要诗人的比拟以标榜词人的地位,如江藩跋《词源》云:“玉田生与白石齐名,词之有姜张,如诗之有李杜也。”^⑩原文并未对这种比拟的原因作任何分析,而纯粹是欲借李、杜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将姜、张置于词史的相应位置,表达其强烈的推崇之意。再如吴蔚光《自怡轩词选序》云:“文极于《左》,诗极于杜,词极于姜。其余皆不离乎此者。”^⑪直接借与《左传》、杜甫的并列关系,将姜夔放在了词史的最高位置。这类比拟往往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主要体现的是论者的偏好与立场。

不过,这种概括性的比拟,也不乏具有客观词史定位性质的,如《四库全书总目》论吴文英云:“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盖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⑫谭献《复堂词话》评秦观云:“淮海在北宋,如唐之刘文房。”^⑬两段话的言辞之间都没有流露出明显的褒贬之意,而李商隐、刘长卿皆属于能够自成一家,但又并非如李白、杜甫那样具有公认崇高地位的诗人,因此以他们作为比拟的对象,也就体现出对词人进行客观的词史定位的目的。

词史的定位,也包括词人在词史演变中的位置或作用的定位,如《四库全书总目》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

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⑭在对词史演变
的整体把握基础上,将柳永、苏轼置于关键位置,
以柳永比白居易,当是着眼于二者在诗词的通俗
化及叙事方面的开拓之功,而以苏轼比韩愈,则应
是以韩愈的“以文为诗”说苏轼的“以诗为词”,指
出其突破文体限制,为词体发展做出的贡献。再
如宋翔凤《乐府余论》云:“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
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⑮杜甫被视
为盛唐与中唐诗歌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这
里以姜夔与之相比,也正是从这一角度,赋予姜夔
在词史流变中的关键地位。这样的比拟虽未必能
够为今人所接受,却也反映了清初以来浙派以姜
夔为主宗的观念及其影响。^⑯

系列的作者比拟,以刘熙载和王国维的论述
最为典型,刘熙载《词概》云:“词品喻诸诗,东坡、
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梦窗,义山也;白石、
玉田,大历十子也。其有似韦苏州者,张子野当
之。”^⑰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云:“故以宋词比
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
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
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⑱这两段话
的论述方式颇为相似,只是王国维的褒贬之意更
为明显,如“大历十子之流”的鄙薄、“非先生不
可”的推崇之意都极为明显。当然,即便没有这
种带有褒贬色彩的语言,通过各组比拟本身选择
的诗人对象亦可体现出论者对各词人的评价,而
各词人之间亦因此具有了高下之分,如被比为李、
杜,则其评价显然是要高于大历十子的。因此这
种方式除了包含对单个词人的评价以外,也体现
出着眼于整个词坛,并借助诗史以建构经典词人
之格局的意识。

2. 风格。立足于词人风格的以诗比词,主要
是通过与个性特征明显的诗人的比拟,更便捷而
明确地表达对词人风格的判断,同时也可藉此表
达论者的褒贬之意。如郑文焯评吴文英词云:
“宋词家之有梦窗,殆犹唐诗人之长吉乎?其灏
气流转,文采高丽,纯学清真,而未得其浑。”^⑲夏
敬观亦云:“梦窗七宝楼台,自古胜消,然古芬披
挹,固词中之长吉体也。”^⑳李贺诗以奇谲瑰丽为
突出特征,将吴文英词比为“词中长吉体”,不仅

能够直观而形象地形容出梦窗词秾丽幽邃的风
格,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七宝楼台”、“不成片
段”的偏见。而张德瀛《词征》评朱敦儒云:“朱希
真词品高洁,妍思幽邃,殆类储光羲诗体,读其词,
可想其人。”^㉑则不仅从风格上将朱敦儒词与储光
羲诗相比,更从风格而联系词品,并最终上升至人
品的评价,引入“人品与文品”的话题,也反映了
词体观念的转变。

3. 内容。这里的内容,指的是评论词人时,着
眼于其创作的整体情况,就其作品涉及的内容将
其与诗人进行比拟。其中如刘熙载评苏轼词云: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
言也。”^㉒是从创作的角度,就其作品涉及内容的
广度以苏词比杜诗。不过更能体现清人论词倾向
的是就作品的内涵与情感以词人比诗人,而杜甫
是此类词论中最常见的比拟对象,如陈廷焯评王
沂孙云:“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
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
中曹子建、杜子美也。”^㉓内容上的“感时伤世”,
和表达上的“缠绵忠爱”,体现的是“忧生念乱”之
意和诗教“温柔敦厚”之旨,在这个意义上,以碧
山词比杜诗,确有其合理性。再如王鹏运跋《山
中白云词》云:“乐笑翁……且值铜驼荆棘之时,
吊古伤今,长歌当哭……论者谓词之姜张,诗之李
杜,不诬也。”^㉔也是从反映国破家亡时的现实与
忧生念乱的情感内涵上肯定了将张炎比于李杜的
说法,比起江藩、吴蔚光等人的说法,显然更具说
服力。这种由词的内涵出发,以诗人比词人的作
法,也反映了清代尤其是晚清词家对于词的内涵
思想应有关于现实,义近《风》、《骚》之要求的影
响。

由上所述,可知诗词作者比拟的具体对象,深
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论者的主观立场喜好不
同,则比拟的对象自然就不同。如同样是以杜甫
为比拟的对象,仅文中提到就有姜夔、张炎、苏轼、
辛弃疾、周邦彦、王沂孙等词人。二是比拟的具体
角度,刘熙载曾说:“柳耆卿词,昔人比之于杜诗
……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恐少陵不
许。”^㉕比拟,原本就只是立足于事物之间部分特
征的相似,诗人词人的比拟,当然也无需全方位的

相同。因此,比起具体论述中诗人词人的对应关系是否合理,或者哪一种比拟更合理的探讨,不同的比拟对象和角度本身所反映的论者的立场和用意更值得关注。

(二)词史

从史的角度进行的“以诗比词”,其主要内容除了借诗史以表达对词史阶段的评价外,更主要在于建构词史时对诗史的模仿与借鉴。具体的对象也可分为两类:一是词史的分期及具体时段,二是词史的演变过程与规律。

1. 针对词史分期的“以诗比词”,其目的首先体现为借诗史表达对词史兴衰的衡量,如潘德舆云:“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②6}即是借唐诗在诗史中的崇高地位表达对北宋词的肯定。而陈廷焯云:“以词较诗,唐犹汉魏,五代犹两晋六朝,两宋犹三唐,元明犹两宋,国朝词亦犹国朝之诗也。”^{②7}以诗词发展的不同时段相比拟,不仅表达出对各个具体时段的评价,亦有衡量整个词史的盛衰演变之意。这类词论与作者的比拟相似,因此这里不再做过多的介绍。

对诗词分期的比拟,更为典型也更具理论意义的,是对唐诗初盛中晚四期说的模仿与借鉴,清初的刘体仁最早提出词的初盛中晚说,其《七颂堂词绎》云:“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鹿虔哀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②8}以唐五代至明之词分别配于唐诗的初盛中晚,其依据之标准不仅在于各时期词的成就,也涉及了对词史乃至词体特征演变分析。此后尤侗《词苑丛谈序》云:“然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②9}以为唐诗与宋词之相对,如“天地生才,若为此对偶”。故将宋词亦分为四个时期,甚至其时间先后及盛衰演变之进程都与唐诗恰好形成对应。该序文末段云:“诗既

有史,词独无史乎哉。”^{③0}所以这段话中唐诗宋词完全对应的说法虽有些过于理想,但其词史的意识还是值得肯定的。晚清江顺诒《词学集成》中针对这两段话说:“比词于诗,原可以初盛中晚论,而不可以时代后先分。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琐屑,周、张之纤靡,已近于晚。北宋惟李易安差强人意。至南宋白石、玉田,始称极盛,而为词家之正轨。以辛拟太白,以苏拟少陵,尚属闰统。竹山、竹屋、梅溪、碧山、梦窗、草窗,则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极。”^{③1}认为尤、刘两家之言都“未得要领”。他与前面两家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对盛、中、晚的判定,尤其对周、秦与姜、张的评价。其中对南北宋词的态度,尤其是对姜、张的推崇典型地体现了浙派词学观的影响。虽然主观色彩稍重,但能够跳出时间先后顺序的思维定势,衡量词史自身盛衰之变的特点,也颇有意义。

唐诗的初盛中晚分期说成型于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而关于词史分期的讨论,基本到清代才展开,类似初盛中晚的说法也基本只存在于与唐诗对照的论述中,因此可以肯定清代词家乃是受明代唐诗分期说的影响。虽然这种借鉴唐诗分期方式的做法最终并未被词界主流所接受,但其建构词史的努力毕竟是值得肯定的,且其中对于词史或词体演变分析也颇有理论价值。同时,这种现象也反映了词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向诗学借鉴、受诗学影响的事实。

2. 探讨词史演变时通过与诗的比拟、比较分析其原因和规律。明末陈子龙已有此方面的论述,《幽兰草词序》云:“词者,乐府之衰变,而歌曲之将启也。然就其本制,厥有盛衰。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③2}将五代词比拟于齐梁诗,不仅是从词史盛衰的角度,更包含对文体演变之规律的分析。清江顺诒《词学集成》云:“词在五季,正如诗在初唐,有陈、隋之绮靡,故变为各体之宏大。有晚唐之纤薄,故变为小令之秾厚。此亦时势使然,与兴亡国势不相涉。”^{③3}借唐诗之演变,探求五代词风形成之原因,而从诗词内部寻求其变化之原因与必然性,并指出其不关乎时势等外在因素,事实上

已经涉及了文学发展内部规律的分析。而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③出于对文学之“真”的要求,将南宋词与中唐以后诗并论。其目的虽在于表达对南宋词的否定,但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确实揭示出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即饶宗颐先生所云:“由自然而臻于巧练,由清澹而入于秣挚,乃文学演化自然之势。”^④

(三)作品

清代以后诗词作品的比拟、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借诗重词的目的。其所重的对象,则有具体作品与词体本身两个层面。前者如刘熙载评李白词云:“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阙,足抵少陵《秋兴》八首。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后乎?”^⑤杜甫诗在诗史上具有极高地位,《秋兴》八首更是经典之作,此处用“足抵”二字,直接将李白的这两首词与之放在了同一层次上,无疑是巨大的肯定。

后一种则主要是通过系列诗词作品的比拟,体现出推尊词体的目的。如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云:“词有与古诗同义者,‘潇潇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麦蘩之诗也。‘又是羊车过也’,团扇之辞也。‘夜夜岳阳楼中’,日出当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风一半’,鲛居之讽也。‘琼楼玉宇’,天问之遗也。”^⑥所举之诗,或有黍离之悲,或含讽喻之旨,或寓个人之兴感,而从内涵上将词与这些诗作进行类比,事实上也就是从功能内容上将词提高到与诗一样的高度,即指出词可以有关于现实,蕴含讽喻寄托之旨,而非游戏小道。这也是清代词家推尊词体时的典型作法。张德瀛《词征》亦有类似之论:“词有与风诗意义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巨制,多寓微旨。如李太白汉家陵阙,免爱伤时也。张子同西塞山前,考槃乐志也。王仲初昭阳路断,小星安命也。温飞卿小山重叠,柏舟寄意也……”^⑦更是直接将词作比附于《诗经》中的经典篇目,并点明词可“寓微旨”,更明确地体现了通过揭示词在内涵上的与诗同义以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

(四)体式

诗词体式的比附,重在从创作的角度,吸收借鉴诗歌的创作经验。清代的此类词论较之张炎论述更为细致,目的也更明确。如顾璟芳云:“词之小令,犹诗之绝句,字句虽少,音节虽短,而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⑧与张炎之意相似,而对小令的具体作法与需要呈现的面貌要求更细致、明确。再如蒋兆兰《词说》云:“初学词当从诗入手,盖未有五七言不能成句,而能作长短句也。词中小令,收处贵含蓄,贵神远,与诗之七绝最近。慢词贵铺叙,贵敷衍,贵波澜动荡,贵曲折离合,尤与歌行为近。其他四五七言偶句,则近于律诗。是故能诗者,学词必事半功倍。”^⑨在由诗入词的学词途径之基础上,将诗词中的各种体式进行对比,并指出其在表达方式、风神面貌上的相似之处,更明确地表现出借鉴诗歌创作经验的目的。诗词之间的各种具体形式能否如此高度的契合固然是有待讨论的,如清初毛先舒云:“填词长调,不下于诗之歌行。长篇歌行,犹可使气,长调使气,便非本色。”^⑩就在通过与诗之歌行的对比,指出词之长调创作不易的同时,也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以及长调作为词之一体,所应具有温柔含蓄之本色。但是这种诗词体式间比附,重在吸收诗歌对应体式在创作上的经验,追求其风格、意境上的高度,自有其现实意义。

以上所述,只是以诗比词中比较常见的几个方面,其实际内容要更为丰富,如派别、创作手法等都有涉及。其方式也更为复杂,如以词的作者与诗的时代、具体作品等的交叉比附等都很常见。但仅从文中所述的几个方面,已可看出,“以诗比词”确实是词学批评中极为常见的方式。而不同内容、角度的“以诗比词”,也都各自体现了不同词家的词学观念与立场,蕴含了丰富的词学价值,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以诗比词”现象的原因与理论价值分析

比拟是文学批评中常见的方式,在词学批评中被用作比拟或比较的对象的,当然不止诗歌一种,即以文体种类而言,文章、散曲乃至传奇、小说

都曾出现过,但“以诗比词”不仅出现的频率极高,其内容也涉及词学的方方面面,且更具系统性与理论性,因此其性质与意义都非同一般。无论是比拟还是比较,对应双方的相似性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寻找以诗比词现象大量出现的原因,首先应从诗词间的相似之处入手。

首先,从文体的角度来说,作为兴起于诗歌之后的又一种韵文文体,词的形成本就深受诗歌的影响。词源于诗之说自宋代就开始出现,如王灼云:“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④2}而后人论词之起源,或上溯《诗经》,或上接汉魏乐府,或联系隋唐声诗。正如王耕心序《白雨斋词话》所云“故词之为体,诗以为祢,曲以为子,识者为之,莫不沿溯汉、魏,游衍屈、宋,以薪上窥《三百篇》之旨。意谓不如是不足以澄其源,涉其奥”^{④3}。词源的问题至今仍在讨论研究中,但无论其真相如何,词与诗之间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也因此,二者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质特征都有颇多相似之处。历代词论中关于诗词同源异体或同体异用之说屡见不鲜,即便在论述词体特性之时,也总是在与诗的对照中进行,如李清照《词论》中所谓“句读不葺之诗”“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④4}等论词体特征的内容,主要就是为了与诗形成区别。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词之为体,要妙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④5}算是对词体特质最精妙也最为人所接受的一段概括,也依然以诗为对照,且包含着对诗词特质存在交叉的认同。这也正说明诗词在体性上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词的创作基本上是由诗人兼词人的身份而完成。早期的文人词为“诗客曲子词”^{④6}自不必说,即便在词体成熟而独立于诗之外以后,词作者本身也基本是先学诗而后学词的。对于这一点,清代以后的词家曾多次明确地指出。如陈廷焯云:“诗词一理,然不工词者可以工诗,不工诗者断不能工词。故学词贵在能诗之后,若于诗未有立足处,遽欲学词,吾未见有合者。”^{④7}近人夏敬观也说:“唐词初由诗变,所以浑厚,故学词者必先知诗,乃造诣上乘。”^{④8}先工

诗而后学词,则作诗之方法、习气自难免带入词中,词的风格、内涵乃至气象境界也自然而然地与诗有相通之处。这是由于创作者的身份,无意识地受诗影响之处。而在词的发展过程中,还有有意识地“以诗为词”现象存在。“以诗为词”本是陈师道为批评苏轼的创作而提出,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援诗歌元素以入词在词的创作中其实是普遍现象,如黄庭坚谓晏几道词:“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④9}贺铸自云:“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⑤0}张炎《词源》谓周邦彦“善于融化诗句”^{⑤1}、贺铸与吴文英“皆善于炼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⑤2}。以诗为词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如对诗之法度的借鉴,对诗句、诗意、诗境等的化用等等,但词的创作受诗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而这种影响的存在必然使词在风格、内涵、意境等诸多方面与诗存在相似之处。

诗词之间这种文体源流上的继承和体性上的交叉等关系,是词能够比之于诗的前提。而历代词论家热衷于选择以诗来比词的原因,从浅层次来说,是因为诗歌成熟于前,在词学批评展开的时候,诗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地位、时代风格、重要作家以及经典作品都已经更为人们熟悉。因此,以诗为比拟的对象,能够更明确而便捷地表达出论者对词史、词家等的认识与态度。从深层来说,则与词学批评中惯于援诗以论词的习惯有关。如前所说,词人基本上同时也是诗人,在批评领域中,词学家也多是诗学家,因此在论词时习惯于将自己在诗学上的素养用于其中。事实上,词学批评的进行,一开始就是在与诗的联系中展开的,如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为现存最早的词学专论,就已经从源流上将词上溯乐府,并引六朝和隋唐歌曲作比较。^{⑤3}而到晚清如陈廷焯、王国维等人的著作中,更多有诗词并论、通论之处。词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批评范畴,如“委曲含蓄”、“清空骚雅”、“比兴寄托”、“沉郁”、“柔厚”等等,也都是从诗学中借鉴而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评价具体词人词作时引入诗歌中的相应对象以作参照、在建构词史时模仿借鉴诗史的模式或者分析词体、词史演变时借鉴诗学理论,都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以诗比词”现象中所反映的词在创作和理论上对诗歌的借鉴,也是其主要价值之一。其另外一个价值则在于这种现象反映了历代词家的尊体意识。“以诗比词”与尊体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在具体的词论中明确地借由将词与诗联系在一起来表达推尊词体的观点。如陈维崧《词选序》云:“东坡、稼轩诸长调,又赳赳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⑤其将苏、辛词比于杜诗,直接的目的就是说明词非小道,尊体的目的非常明显。再如前文列举的刘体仁等人从内容上指出词与诗同义的词论,都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第二个层面是“以诗比词”这种批评方式本身潜在地体现了尊体的意义。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体系中有至高的地位,它不仅是文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载体,更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而词原本不过是一种娱乐性的文学,且长期被视作有妨声誉的小道末技,那么从词的内涵、风格或境界等方面将词与诗相提并论,本身就意味着对词体性质和地位之认识的变化。而“以诗比词”作为一种现象,其发展也反映了词体地位变化的过程。如前所说,这种批评方式在宋代还只是零星出现,且多只是在评论具体词人词作时引入诗中对象以作参照,是一种无意识的偶然现象。而清代以后,则可以明显看到这时的词家是有意识地在寻求诗词的相通之处,并借鉴诗史、诗学以建构词史和词学理论。这种有意识地“以诗比词”的行为,隐然体现了认为词坛、词史可以具有与诗相似的格局以及诗词之间存在一定共通的发展规律的观念。且随着这种批评方式的发展,至晚清词家如陈廷焯、王国维等人,在“以诗比词”之时,已经不再是词对诗的一种攀附,而是将两种文体放在同一高度来论述。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也意味着词已经被纳入主流文学的队列中,成为一种可以与诗同义的文体,反映了词体地位提高的结果。

诗词关系的复杂之处,在于词一方面从创作到理论皆不断从诗中汲取养料,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又不断地试图摆脱诗的笼罩而取得独立的地位。“以诗比词”集中体现了前一方面的内容,但这种批评方式聚焦于诗词的相似之处,难免给人

以忽视诗词差异和词体独立性的错觉。但是,比拟本就是在两种不同的事物之间进行的。清彭孙遹评曹贞吉《浣溪沙·莲画》词云:“‘江湖无恙白鸥天’,是钱、刘佳境,然毕竟入诗不得,解人自知之。”^⑥“以诗比词”确实集中地突显了诗词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但正如词尽管在意境、风格等诸多方面类诗而毕竟不等于诗,“以诗比词”之关注点虽在于诗词的共性,也并不意味着对二者的差异和词体独立性的否定。

结 语

“以诗比词”的批评方式往往是以一种带有直观、印象式的方式对诗词进行比附,表面看来似乎只是词家一时兴到的游戏之语;而且由于立场和目的的差异,其中具体的对应关系千差万别,也使这种批评方式看似随意而不具逻辑性与理论性。但这种看似随意的比拟和比较,其实往往凝聚词家对词学现象的深入思考与总结。其中诸多对于作家、作品和时代的诗词比拟,不仅明确地表达了对具体对象的评价,也可反映不同时期、不同词家对词体、词风、词旨的不同取向,直观而生动地呈现了词史与词体的演变。另外,“以诗比词”意味着将诗词放在同一层面来进行考察,无论其出发点如何,这一现象大量出现且越来越具理论性系统性的结果,就是词被纳入了与诗具有相似性质的主流文学体系中,成为一种严肃的文学,而不再是小道末技,既体现了历代词家尊体的努力,也反映了尊体的结果。而以诗为参照来论词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词的发展以诗为背景,不仅在创作的层面对诗歌有所借鉴,而且在词史及词学理论的建构中也自始至终以诗为参照和借鉴的对象。因此,“以诗比词”这种批评方式虽然看似随意而不成体系,但作为一种现象,它不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了词体、词体观念与词学思想的演变,同时也是诗词关系最直接而集中的反映。

“以诗比词”的现象虽然只是发生在诗与词两种文体之间,但因为诗词是中国古代韵文最重要的两种体式,所以这种文体之间的比拟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思维的体现。中国古代文体众多,不仅文体形成有先后,而且因其不同的

功能而形成了一定的高下尊卑序列。这对于处于尊崇地位的文体来说,自然是有着无言的优越感,而对于被视为卑下、小道的文体来说,要赢得自己的发展空间,要扭转卑下的文体地位,竭力向处于尊崇地位的文体靠拢、攀附,也就成为一种基本的文体批评定势。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出文体往往与前一文体之间,在体性上有着较多的交叉,这种交叉使不同的文体之间,必然有着共同的体性区域,这也为两种文体的异同之辨,提供了充足的学术空间。诗与词两种文体即典型地体现了这样一种文体关联现象。研究文体谱系及文体批评思维的发展,“以诗比词”堪称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批评现象。

- ①参见陈水云《杜甫与“词中少陵”》,《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6期;谷曙光《“词中少陵”补笺》,《杜甫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欧明俊:《词中杜甫说总检讨》,《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2期;张学芬《“词中老杜”说评介》,《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 ②参见陈玉凤《词品喻诸诗论析》,《贺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 ③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鯖录》(与《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合刊),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3页。
- ④黄庭坚著,屠友祥校注:《山谷题跋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 ⑤黄裳:《演山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39页。
- ⑥《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47页。
- ⑦⑨⑩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5、401、269、3990、2503、4163、4010、618、3227、3222、617、4079、1467、4629、609、74、255、259页。
- ⑧张綖、谢天瑞撰:《诗馀图谱》,《续修四库全书》第17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 ⑪许善宝评选:《自怡轩词选》,嘉庆元年刻本。
- ⑫⑭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0、5449页。
- ⑬如汪森《词综序》云:“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光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

- 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载朱彝尊、汪森编《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26、497、496、487页。
 - ⑳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载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3页。
 - ㉑《词林翰藻·郑文焯致朱祖谋书》,《词学》第七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
 - ㉒夏敬观:《忍古楼词话》,《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第154页。
 - ㉓②④⑦陈廷焯撰,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74、567、848、673页。
 - ㉔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 ㉕⑨徐钊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 ㉖陈子龙撰,王英志编纂校点:《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7页。
 - ㉗⑬⑮彭玉平撰:《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9、211页。
 - ㉘⑮饶宗颐:《人间词话评议》,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1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22页。
 - ㉙④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 ㉚⑬⑮欧阳炯《花间集叙》,载华钟彦撰《花间集注》,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1页。
 - ㉛⑬夏敬观:《映庵词评》,《词学》第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 ㉜④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页。
 - ㉝⑤脱脱等撰:《宋史·贺铸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03页。
 - ㉞④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 ㉟⑤曹贞吉:《珂雪词话》,载朱崇才编《词话丛编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作者简介:彭玉平,1964年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向娜,1986年生,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蔚〕